

辽韵长歌

liaoyunchangge

在祖国北方的苍茫画卷中,赤峰宛若一颗璀璨明珠,镶嵌在燕山北麓与辽阔草原之间。西拉木伦河、老哈河犹如两条奔腾的玉带,蜿蜒穿梭于群山沃野,绘就山河壮美的雄浑底色。

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,早在远古时代就升腾起文明曙光,孕育出以“C”形玉龙为标识的红山文化。

这里亦是契丹人繁衍生息的故土,从北魏时期契丹部族初兴于松漠之间,到耶律阿保机仿汉唐称帝,再到辽圣宗励精图治将辽推向鼎盛,这里始终是辽的政治中枢、文化腹地与经济要冲,见证契丹成长兴衰,承载南北文化交流。

这里至今仍留存着多处辽时期的珍贵遗存,辽上京的“日”字形双城遗址、辽中京的大明塔与三重城垣、辽庆州白塔的精美浮雕,以及烧制辽三彩斑斓釉色的缸瓦窑,还有那些散落在草原与丘陵间的辽墓葬,沉淀下宏富深厚的辽文化底蕴,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。

辽源勃兴 遗珍流光

“马牛到处即为家,一卓穹庐数乘车。千里山川无土著,四时畋猎是生涯。”

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,契丹这支从草原崛起的传奇力量,如流星划破夜空,短暂却璀璨,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

“契丹源出东胡族系,世居潢水(今西拉木伦河)和土河(今老哈河)流域,这一区域作为契丹的发祥地,构成了辽疆域的核心雏形。”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盖之庸说。

公元907年,耶律阿保机称可汗。916年,耶律阿保机仿汉唐制度,在龙化州(位于今通辽市境内)称帝,是为辽太祖,建元“神册”,辽正式建立。918年,建都于临潢府(今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)。938年,辽获燕云地区(今河北、山西北部 and 北京等地区),版图扩展至今河北、山西北部。《辽史》称其疆域“东至于海,西至金山,暨于流沙,北至胘肭河,南至白沟,幅员万里。”

资深辽史学家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认为,契丹族创立的辽王朝秉承大唐遗风,是位列正史、疆域广阔、遗存丰富、影响深远的中华王朝。辽开发建设了中国北方广袤的土地,普遍建立州县进行有效管理,奠定了中国北方的疆域基础。

契丹拥有燕云十六州后,开始自认“中国”,称辽人为“中国之民”,力争“中国”正统。辽道宗时,耶律俨修《皇朝实录》,明确宣称辽为黄帝后裔,以“炎黄子孙”身份接续“中国”谱系。

辽的“中国”认同,在制度实践上体现为遵循“中国之制”,即在礼制、官制、行政、科举、律法等方面,继承隋唐以来的中华传统政治制度;同时结合自身情况,不断丰富治理经验,为后世大一统行政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。

辽建立的中央机构以五京制和捺钵制为核心。辽五京分别是上京临潢府(今内蒙古巴林左旗)、中京大定府(今内蒙古宁城县)、东京辽阳府(今辽宁辽阳)、南京析津府(今北京)和西京大同府(今山西大同)。

在五京并立格局中,赤峰的上京临潢府与中京大定府分别作为早期和后期政治中心,成为王朝统治的“双核心”。其中上京作为五京之首,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。

同时,辽上京作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中国“百年百大考古发现”,是赤峰辽文化遗存的核心瑰宝。

“辽上京遗址‘日’字形的双城并列格局,体现了‘因俗而治’的统治思想。契丹皇帝和贵族住北城,汉人、商人、使臣等居住南城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曾担任辽上京考古队队长十多年的董新林认为,“回”字形的宫城皇城环套布局,且有明确的中轴线,是效仿中原王朝“择中而立”“皇权至上”的思想而设计。

辽中京遗址位于宁城县,规模更为宏大,城市建筑布局主次分明,结构严谨。中京城的建设更多吸收了中原都城的规划思想,街道呈棋盘式布局,宫城位于城市中轴线上,体现了对唐宋都城制度的借鉴与发

展。中京城内出土的黄色琉璃龙鳞纹残砖、绿釉龙纹筒瓦等建筑构件,显示了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,也见证了这座都城的昔日繁盛。

辽文化交融的华彩,更直观地体现在艺术瑰宝之上。赤峰宝山辽墓的壁画,便是“唐风辽韵”的极致体现。壁画中的《颂经图》和《寄锦图》,其艺术蓝本直接源于唐代绘画风格,画中逼真的垂柳、竹林等亚热带植物,极有可能出自中原画师之手。这些作品表明,早在辽初,中原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已在进行深层次相互影响与融合。

同样,从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中出土的花瓣形金盏、鎏金高士图银杯等金银器精品,既带有中原风格,又融入了西域乃至中亚的文化元素,证明赤峰大地曾是欧亚大陆多元文化交融的重要枢纽。

赤峰博物院辽代历史文化博物馆馆长黄文博介绍,赤峰现存两座辽代都城、三处帝陵、数十处高等级贵族墓葬。这些遗存中,既有契丹风格的金银器、鸡冠壶、马具,也有中原制式的铜镜、碑刻、瓷器,更有融合各族特色的玉器与造像。件件遗珍皆是辽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物化载体,见证着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相融。

政经弘业 制启新章

辽能够雄踞北方200余年,与北宋、西夏等政权对峙而立并自称“北朝”,究其根本,在于契丹在政治与经济领域构建起一套以唐制为根基,以宋规为参照,兼融契丹传统的制度体系,既有草原民族的文化本色,又吸纳了中原王朝的治国智慧,在“学唐比宋”的探索中实现了“华夷同风”的制度创新,为辽盛世奠定了坚实的政经根基。

这套制度体系的形成与完善,不仅见于《辽史》等文献记载,更被赤峰辽上京、燕云地区考古出土的官印、文书等实物所印证,成为辽文化高度发展的核心标志。

辽宁师范大学教授李玉君在《华夷同风——渐趋一体的辽代农牧交流》一文中指出,契丹人通过出使、贸易、劫掠等活动熟悉了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和灿烂文化,从而产生对中原王朝的历史文化认同。自称“天皇帝”的辽太祖,“慕高皇帝,故耶律兼称刘氏。”

耶律阿保机建国后,效仿中原礼制建立皇都,册立太子,确立“尊孔崇儒”的国家思想根基,同时兼容佛道,形成多元文化治理框架。

这种治理智慧在“南北面官制”中达到顶峰——北面官以契丹旧制管理游牧部族,南面官仿中原官制治理汉人区域。

在科举官学方面,辽王朝以唐宋之制取士,选拔了一批胥臣汉臣,加速了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。有汉人血统的韩德让曾身兼大丞相和南、北院枢密使,集军政大权于一身。

“四时捺钵”制度则将游牧传统与政治运作完美结合。皇帝随季节迁徙,在春水、夏凉、秋山、冬寒四地处理政务、联络部族,形成“移动的朝廷”。

有专家指出,捺钵不仅是游牧习俗的延续,更是辽政权维系部族联盟、巩固统治的政治手段,

在农牧文化交融中占据独特地位。经济上,辽凭借上京、中京等的核心地位,成为南北贸易与东西方交流的枢纽,形成“驼铃踏沙、胡商络绎”的国际都会景象。

宋辽之间很早就有边境互市,即使在双方战争期间,榷场也不废罢,“戎退商行”成为常态。宋辽缔结澶渊之盟后,双方正式确立榷场之制,并“固守盟好,互市不绝”。此外,辽与西夏、西域诸国、吐蕃各部也都保持着榷场边市或朝贡贸易。

辽上京考古发掘出的回鹘营、驿站、作坊遗址,印证了这里曾是多民族商贸聚居地;铁犁与马具的并存,展现了农耕与游牧经济的互补共生。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更使这里成为东西方商品的集散地,契丹银币的铸造工艺、三彩瓷器的纹饰风格,均可见波斯、中亚文化影响。这种开放型经济不仅造就了辽的富庶,更促进了文化的多元融合。

1995年夏,考古人员在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壁画中,发现了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“西瓜图”。该壁画中,在墓主人前方陈放一具供台,台面上有两个大果盘:一盘盛放石榴、杏、桃等五种水果,另一盘盛有三个碧绿色的长圆形西瓜。

“自上京东去四十里,至真珠寨,始食菜……遂入平川,多草木,始食西瓜。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,以牛粪覆棚而种,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。”五代时的胡峤在其《陷虏记》中记载,他在辽境内首次品尝到西瓜,这种瓜种源自契丹与回纥的战争。回纥被契丹攻破后,西瓜被引入辽。

辽建立前,契丹地区的经济形态以畜牧业为主,后来农业经济逐渐兴起,与畜牧业同居经济核心地位。辽中后期,上京道北、西北地区的屯垦面积不断扩大,漠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得以发展。整个辽境内的牧、农经济区分布呈现出“农”向北扩、“牧”往(西)南移的趋势。中原的纺织技术、室韦和渤海的金冶技术传至辽境,各族群相互学习生产技术,促进了不同形态经济的深度融合,为北方农、牧混合经济格局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辽的经济繁荣还体现在手工业的高度发达。陶瓷业形成了独特的契丹风格,鸡冠壶、盘口瓶等器物既适应游牧生活需求,又借鉴中原制瓷技艺;金属铸造业以精湛工艺打造货币、饰品与兵器,契丹银币的精美镌刻堪称代表。2024年元宝山



盘口穿带白瓷瓶。



契丹银币。(资料图)

辽墓出土的绿釉瓷盘与铁马镫,以及骑马墓中的镶铜口白瓷盘,均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。而辽上京遗址中发现的各类作坊遗迹,表明这里已形成规模化的手工业生产体系,成为支撑王朝经济的重要基地。

赤峰大学契丹辽文化研究院院长任爱君在其撰写的通识历史著作《辽史》一书中指出,契丹辽朝展现出强劲经济发展能力。在中国古代南北方基本经济区域的构建与发展中,因辽朝政治势力的强大,导致中原地区基本经济区域的逐渐南移,也改变了北方地区单一的游牧经济发展形态,不仅出现大量农田,也出现了大批新兴城镇,催动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更趋完善,生产门类更加齐全。

融汇南北 脉承千秋

文化是民族的灵魂,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纽带。

辽文化的核心特质在于“融汇南北”,它打破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壁垒,构建了双向互动、深度融合的文化交流模式,成为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生动例证。

契丹文字的创制堪称典范,公元920年契丹大字,925年契丹小字相继问世,均以汉字为基础,借鉴汉字的笔画、结构与造字规律,又契合契丹语言的发音与语法特点,赤峰出土的辽时期碑刻、墓志中,契丹文与汉文并行书写,成为“华夷同风”最直观的文字见证。

青砖垒砌起千年风骨,檐角挑起过时代风云,辽塔早已深深镌刻进中国北方的文脉肌理,它们既是辽宗教文化的载体,亦是当时工艺水准的极致体现。

如今行走在北方大地,一座座雄伟的辽塔向天而立。据了解,全国存有约百座辽塔,其中赤峰地区就有8座,这些辽塔历经千年巍然矗立,无声诉说着辽的辉煌与沧桑。

辽中京遗址内,大明塔如巨人般俯瞰着千百年的风云更迭,八角十三层密檐,82米的高度直插云霄,底座直径34米,每面的浮雕造像栩栩如生,仿佛在讲述辽时期佛教的昌盛。

而在巴林右旗的查干沐沦河畔,另一座辽塔精品——辽庆州白塔,则以另一种姿态诠释着契丹人的审美与信仰。它通体洁白,塔身镶嵌的856面铜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曾悬挂的2240支风铎随风鸣响,被史学界誉为“契丹民族建筑之瑰宝”。

山西应县木塔通高67.31米,全部采用木结构搭建,没用一颗铁钉,却历经千年风雨、多次地震和战火的洗礼,依然英姿不减,堪称

建筑史上的奇迹。

宗教信仰的交融共生,彰显着辽文化的包容特质。契丹早期信奉萨满教,保留自然与祖先崇拜传统,随着与中原交往加深,佛教、道教传入契丹腹地并成为主流宗教。辽庆州白塔、辽上京南北塔、辽中京大明塔,形制承袭中原佛塔风格,又融入契丹装饰元素,塔身雕刻的莲花、飞天纹样,兼具中原佛教艺术与草原游牧特色。

契丹贵族尤为推崇中原文化,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购书万卷藏于医巫闾山望海堂,还精通阴阳、音律、医药,善于绘画,能作契丹文和汉文文章,可谓多才多艺,是兼通多元文化的典型人物。辽圣宗、兴宗、道宗、天祚帝等均善作诗文。辽时期的绘画、歌舞、建筑等受唐宋影响较深,但也兼具自身特色。

辽诗不仅在风格上模仿唐诗宋词,更在技法上有所传承。萧观音作为辽时期最著名的女诗人,其组诗《回心院》句句缠绵,意境优美,“换香枕,一半无云锦。为是秋来转展多,更有双双泪痕渗”,将闺中思念抒发得淋漓尽致;而《伏虎林应制》则气势磅礴,展现了草原民族的豪迈气概。这些诗歌既吸收了唐诗宋词的格律与意境,又保留了契丹人的生活气息,成为民族文化融合的鲜活例证。

“谁将家集过幽都,逢见胡人问大苏。莫把文章动蛮貊,恐妨谈笑卧江湖。”宋哲宗元祐四年(1089年)八月,辽帝耶律洪基生日,苏轼的弟弟、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苏辙作为北宋使节前去看祝,使出回国途中所作的一首诗,意思是:哥哥你名声太大了,连辽国之人都争着问候,有这么高的人气和知名度,看来哥哥你日后是无法享受归隐田园的清静了。

澶渊之盟开启了辽宋和平交往,这为双方的文化交流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。北宋的使节们,在出使辽的旅程中,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,这些诗作被称为“使辽诗”,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辽宋的友好关系。

辽雅乐中的八音十二律也大抵“因唐之旧”。巴林左旗大契丹夫人萧氏墓出土的《辽代浮雕乐图》,图内半浮雕3排12人,身着圆领宽袖或窄袖长袍,腰系宽带,足着高靴,或盘腿或跪式或立式,持琵琶、排箫、笙、箜篌、笛、篳篥、拍板、大鼓、腰鼓、横笛等乐器并舞,不仅体现出辽时期散乐宴饮之盛,更可见“草原丝路”中契丹与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和交融。

郁郁松漠千秋一脉,华夷同风共谱华章。辽虽已湮没于历史长河,但其留下的文化遗产与融合智慧,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。

从辽上京遗址上辽金文化的叠压,到武安州城址在金元时期的沿用,我们看到的不是断裂,而是接力与传承。

今天,当我们在博物馆中凝视那些斑斓的壁画、精湛的金银器,当我们在草原上眺望那些屹立千年的古塔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背影,更是一部中华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发展壮大、绵延不绝的壮丽史诗。

辽风昭昭,辉耀的不仅是万里山河,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的深厚根基与光辉未来。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金泉 摄)

辽风昭昭 辉耀山河

□韩继旺



赤峰市巴林右旗的辽庆州白塔。

辽和融入山回——黑龙河。